

·名人书札·

陶风楼藏杨守敬致倪文蔚手札考释

占如默

内容摘要:柳诒徵陶风楼藏杨守敬致倪文蔚手札十五通,是至今公布的杨守敬最早的手札。内容涉及校刻《古今钱略》、纂修荆州府志、刻印《楷法溯源》等事,为我们提供了杨、倪二人生活与学术交往的丰富、生动的记录,是研究杨守敬早期著述和刻书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陶风楼 杨守敬 倪文蔚 信札

柳诒徵陶风楼藏杨守敬致倪文蔚^①手札十五通,集中写于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五年(1879)间,内容涉及讨论校刻《古今钱略》、纂修荆州府志、刻印《楷法溯源》等事,记述了杨守敬与倪文蔚交往的一些史实(在其自编年谱和他人所作传记中相关细节多不详),是研究杨守敬早期著述和刻书的重要资料。这批手札为《杨守敬集》^②和《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③所未收,兹予以整理,并考释其间所涉人物及相关之事件,以为相关学术研究参稽之资。其中难以识辨之字以□表示。

一(原札序五)^④

豹岑公祖大人钧座:

顷者奉赐诗章,用光小阁,幸甚!敬与梓人、书傭相勾当,日不遑暇,间绎地志之书,成《楚郢都考》《宜都沿革考》二篇,又为《荆州府县沿革

①倪文蔚(1823-1890),字茂甫,号豹岑,安徽望江县雷池乡人,室名两疆勉斋(地志及不少典籍有作“两疆勉斋”)。咸丰二年(1852)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1890)授任河道总督(正二品)。著有《两疆勉斋文存》、《两疆勉斋古今体诗存》、《两疆勉斋馆课赋存》、《两疆勉斋试帖诗存》等。

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1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

④本文根据书信内容,确定了大体书写时间及顺序,录文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序,新编序号后加括号说明陶风楼所藏手札稿原顺序。

表》，付书傭抄之，皆未及覆校。适有便人，遂付以呈览，想谬误不少也。地志之书，最忌附会，征引古书，未见原本，辗转贩鬻，鲜不失真。鄙意仿《桂胜》^①例，先引原书，有考证者低写一格，若原书已佚者，必著见于何书，以此为例。传闻失实之语，苟且钞录之学，皆无可置辞矣。是否有当，伏惟尊裁。敬料理家事三四后，即当诣署拜谒，谨聆教言。使者刻晷解缆，走笔书此。诸惟亮察，即请著安不庄。治晚生杨守敬顿首，五月初六日。

按：函中有“顷者奉赐诗章，用光小阁，幸甚！”语，则本函作于倪文蔚到宜都造访杨守敬并在激素飞青阁留诗后不久。函中有“间绎地志之书，成《楚郢都考》《宜都沿革考》二篇，又为《荆州府县沿革表》，付书傭抄之，皆未及覆校”等语，据《邻苏老人年谱》（下文简称《年谱》）“丁丑，三十九岁”条记“是年，望江倪豹臣^②（文蔚）为荆州知府，续修府志，延守敬为编纂员”，可知倪文蔚到宜都访杨守敬是在丁丑年（光绪三年）。又据信末所署日期，则本函作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16日），时杨守敬在宜都。

倪文蔚到宜都访杨守敬并在其激素飞青阁题诗章事，其《两疆勉斋古今体诗存》卷四有《过宜都访杨惺吾孝廉留题激素飞青阁》诗为证，诗云：“岷江下彝陵，东去益莽荡，夷水从西来，嫩绿泼新酿。划然清浊分，作势不相让。孤城带双流，形胜扼咽喉。故人枕流居，有阁小如舫。开轩坐移时，奇景郁万状。群峰不知名，苍翠列屏障。濛濛江雨来，云气湿衣桁。帆樯到檐际，溪水漫坡长。清晖足娱人，尘事倏已忘。经年困簿书，对此一疏放。君学继桑邠，我才愧逊抗。宜都古名郡，雄据郢门上。颇闻西山西，崖壑更幽旷。载酒期后游，挈舟再相访。”

函中所叙“绎地志之书”当指续修的光绪《荆州府志》。倪文蔚此次造访杨守敬，目的可能是想“延守敬为编纂员”，助其续修《荆州府志》。《荆州府志》为荆州知府倪文蔚主修，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顾嘉蘅担任总纂，于光绪六年（1880）刊行，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均有藏本。倪文蔚此次宜都之行，可能还为延请府志总纂顾嘉蘅。顾嘉蘅生于嘉庆末年，号湘坡，彝陵（今湖北宜昌）人。道光十六年出任河南南阳知府，任期先后长达二十年。在任期间治下物阜民安，深受朝廷器重和百姓爱戴。顾嘉蘅此时应该已经年逾七十，倪文蔚请这位德高望众、政声文名卓著的大员出任总纂，是想广纳贤才编纂出一本流传后世的地方名志。倪文蔚以其个人背景、声望、学识和能力对修纂《荆州府志》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据重修的《荆州府志》职名表可知，他除组织府、县两级现任官员积极参与外，还广纳离任官员和文人名士参与修志，职名表中所列参纂人员有近百人之多。

函中所提到的“《楚郢都考》《宜都沿革考》”二篇，分别收入《杨守敬集》第五册《荆州府志》一书的《荆州古地名考》和《荆州府治沿革考》中，函

①《桂胜》：明代张鸣凤撰的广西历史地理著作。万历年间（1573-1619）先后撰成。

②豹臣：函中均作豹岑，为倪文蔚号。

中“又为《荆州府县沿革表》”当为《杨守敬文集》的《荆州府志》的第一章《荆州府治沿革考》中的《荆州表》《荆州府领县表》《江陵表》《公安表》《石首表》《监利表》《松滋表》《枝江表》《宜都表》等。

函中论及编纂地志之书的原则：“地志之书，最忌附会，征引古书，未见原本，辗转贩鬻，鲜不失真。鄙意仿《桂胜》例，先引原书，有考证者低写一格，若原书已佚者，必著见于何书，以此为例，传闻失实之语，苟且钞录之学，皆无可置辞矣。”这反映出杨守敬治輿地之学的严谨态度。此条基本为倪文蔚所采纳，倪文蔚在《光绪荆州府志·凡例》中云：“志中征引往籍者，必详注出典，不敢窜易原文一字。或全文冗长不关荆事者，始从节录。亦有原书已佚，如盛宏之《荆州记》、袁山松《宜都记》之类，必注明转引何书。凡旧志可因者，仍注明施志字样，庶几无掠美之嫌。”

至于编纂《荆州府志》的体例，函中杨守敬提出《荆州府志》要“仿《桂胜》例”。《桂胜》在地方史志中属上乘之作，《四库提要》云：“《桂胜》以山水标目，各引证诸书，叙述于前，即以历代诗文附本条下。而于石刻题名之类，搜采尤详。又随事附以考证，多所订正。董斯张《吴兴备志》、朱彝尊《日下旧闻》即全仿其体例，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①从中亦能见出杨守敬在輿地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远见卓识。

二(原札序四)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敬前在都城时，张君湘涛、袁君爽秋^②交口称大人为皖江硕学，人伦所瞻。乙亥南旋，因雪庐师^③谒见，谈艺之余，以封君^④古泉谱下示，仰见大贤，宏奖风流，无时不以问学相勖。敬以闻赴，仓皇返舍，自分疏贱，无劳记注，两年之间，自郡城来者，具述大人殷勤下问，愧荷交拜，无以报答，用敢自陈。敬少既失学，长未向道，车尘马足，罕有停期。虽九流家言，皆喜流览，作辍相仍，无所成名。唯金石一端，若有天性，岁逾一纪，寝食未忘。至于泉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袁君爽秋：即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清光绪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江宁布政使、太常寺卿等。有《浙西村人集》。

③雪庐师：即杨守敬的恩师颜宗仪（1822—1861），《邻苏老人年谱》“壬癸，同治元年，二十四岁”条记：“榜发，乃获中第八十名举人。主考为海盐颜雪庐（宗仪）。”颜宗仪，字挹甫，号雪庐，浙江海盐人。清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少负文名，尤工诗赋，有《清邃堂遗诗》。

④封君：是古代受封邑的贵族的通称，泛指拥有爵位和封地的人。此指倪豹岑的族曾祖倪模。

币,虽非专门,时亦旁及。伏念《钱谱》自洪氏^①以来,传摹多谬,昭代名家,始有定说。宜泉^②、燕庭^③,搜罗最博,其书不传。渭园^④、竹朋^⑤,粗具轮廓,未臻精妙。端居多暇,乃以所藏拓本,手自摹刻,得二千余枚。粗有端绪,谨用□□,匆遽不及手拓,工人草率,绝少次第,然其精者,与真不别,若再整齐,实称绝艺。而敬家贫不能购进楮蓄,良工不自毁弃,欲托之封君,自居校雠之列,则力厚而行远。又有《古印谱》二十卷、《砖瓦文字》四卷,皆刻成而力未能印拓。近复仿翟文泉《隶篇》^⑥之例,撰《楷法溯源》^⑦一书,上自魏晋,下迄五季,东北至沧海日本、高丽等碑^⑧,西极塞外姜行本功德记^⑨,南尽滇池大小爨^⑩、南诏等碑^⑪,名碑巨碣,莫不甄录;下至浙东之残

- ①洪氏:指南宋洪遵(1120-1174),字景岩,号小隐。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宋名臣洪皓次子,与兄洪适、弟洪迈,有“三洪”之誉。他博通文史,通晓宋朝翰苑故实,以正直敢言著称。所著以《泉志》一书最著称。
- ②宜泉:即翁树培(1765-1809),字宜泉,号申之,清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为金石名家翁方纲次子。以嗜泉成癖见称,因得大泉范底有“宜泉吉利”四字,遂取“宜泉”二字以自号,在泉币学界以号行。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博学好古,善钟鼎文字,潜心于泉币,尤明于钱法,喜收藏和鉴藏古货币,是乾、嘉间著名泉币学家。泉学著述有《古泉汇考》及泉拓《古泉汇》。
- ③燕庭:即清道、咸间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刘喜海(1793-1852),字吉甫,号燕庭,一作燕亭,山东诸城人。刘统勋曾孙,刘墉侄孙。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历任浙江布政使等。其嗜金石,善鉴赏,精于考证,著《海东金石苑》《长安获古编》《古泉苑》《三巴耆古志》等。其《古泉苑》一书,收图四千六百余种,在当时有“所存古泉,富甲同仁”之称。
- ④渭园:即初尚龄(1759-1841),号渭园,初之椿子,幼承家学,博雅好古,喜考究文字。历四十三年辑《吉金所见录》,嘉庆二十四年(1819)定稿付印。
- ⑤竹朋:即李佐贤(1807-1876年),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汀州知府。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收藏家、诗人。编著有《古泉汇》《书画鉴影》《石泉书屋类稿》等,尤以《古泉汇》著称于世。
- ⑥《隶篇》:清翟云升编撰的一部隶字形义字典,有《隶篇》十五卷、续十五卷、再续十五卷。
- ⑦《楷法溯源》:杨守敬编撰书法著作,有正文14卷,又古碑、集帖目录1卷。
- ⑧据《楷法溯源所采古碑目录》,所采日本碑主要有《日本国片罡缘野甘良三郡题名残碑》;所采高丽碑有《新罗真兴王定界碑》(朝鲜咸兴)《平百济碑》(朝鲜)《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刘仁愿残碑》(朝鲜扶余)《朗空大师碑》(朝鲜)。
- ⑨姜行本功德记:即《姜行本记功德碑》。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班超击败匈奴,汉军为班超镌刻《班超记功德碑》表彰其卓越功勋。此碑后被唐姜行本磨掉刻成《姜行本记功德碑》。
- ⑩大小爨:即《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前者因字多碑大称“大爨”,后者则被称为“小爨”,二碑并称为大小“爨”。
- ⑪据《楷法溯源所采古碑目录》,所采“南诏等碑”有《南诏蛮颂德碑》(云南太和)和“南诏碑”阴。

砖，供阙之造象，有□□□，亦所不遗。此书本敬手辑，而署文昌潘君^①者，此公朴学为敬之□□，穷老著书未就，故推之以报知己。然书至二十馀卷，非五六百金不能成。筹画于知交，亦仅得半，不得已，仰恳大人稍为资助，则敬与潘君皆感且不□。昔贤著书多传之身后，唯金石文字则必亲校，景伯《隶释》是其前，现今之此书□由□□，柳子厚《与萧俛书》^②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有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何言之悲也。敬今年三十有九，两须蟠然，早衰尤甚，无论柳子厚之非所敢望，纵区区不忍废，而闻道已晚，不足自存，感叹辍业，将恐将惧。不贤识小，或不为后世誉，而力小任重，数年以来，家为之落，惜其不成，中夜焦思，当亦大君子所笑其痴，而矜其挚者也。《金石文字》^③壹部是十年来所刻，《论语事实录》^④是前十年所为，虽宗法西汉，实少家法，一知半解，妄灾枣梨。然敬所著书，大半未脱稿，仅以此呈教，如不鄙夷，即望回示。冒昧陈辞，无任战慄，敬请著安不庄。治晚生杨守敬顿首，六月六日。

按：《年谱》“丁丑，三十九岁”条记：“时辑《楷法溯源》成，得倪公助刻书费，又得季音（按：指饶登秩，字季音）及同邑诸友协助，遂鸠工刻之。”与函中“近复仿翟文泉《隶篇》之例，撰《楷法溯源》一书”、“仰恳大人稍为资助”语相合。《楷法溯源》于光绪二年（1876）开始编纂，历时一年完成，光绪三年（1877）七月开雕^⑤，光绪四年（1878）刊行。另据函中云“乙亥南旋……两年之

①文昌潘君：即潘存（1818—1893），字仲模，别字存之，号孺初，清琼州府文昌县（今海南文昌）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至户部主事。同治初，旅居北京，与李慈铭、陈乔森齐名。潘存精通经史，工诗词、文辞，书法尤妙。其收藏汉魏六朝碑板以及唐宋元明诸名家书法碑帖甚富。著有《克己集》《论学十则》《赏花有感》等，后人编有《潘孺初先生遗集》。

②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萧俛（？—842年），字思谦。唐贞元七年（791）进士，元和初年（806）中贤良方正制科，历官右拾遗、太仆少卿、御史中丞、中书侍郎等。

③《金石文字》：即《望堂金石文字》之《初集》。《望堂金石文字》是杨守敬编著的金石学著作中刊行时间最早的一部，精选周、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数代著名碑刻五十种，用双钩法架成，是当时收录历代碑刻最多的双钩摹刻汇编。据牌记，为光绪二年丙子（1876）飞青阁校定。杨守敬《望堂金石文字》从同治九年（1870）开雕，迄宣统二年（1910）陆续完成，历时四十载。是书采取随刻随印的方式，行世多零种单册，其中光绪三年（1877）以前刻成者为《初集》（收碑刻三十二种），以后则收入《二集》。今湖北人民出版社所出《杨守敬全集》第十一册有影印本。

④《论语事实录》：杨守敬早年所著经史方面著作。《邻苏老人年谱》“己巳，三十一岁”条记：“是时除碑版之外，兼习经史，为《论语事实录》成，刻之。亦间有《小学记录》，今不存。”可知《论语事实录》刊刻成于1869年。

⑤《楷法溯源·凡例》记载：“是书经始光绪二年四月，成于三年七月，即以七月开雕。”《楷法溯源》牌记云：“光绪三年开雕。”

间,自郡城来者”和“敬今年三十有九,两须皤然,早衰尤甚”,则本函作于乙亥(1875)两年后的1877年,是年杨守敬三十九岁。此外,函中有“《金石文字》一部是十年来所刻”,而《望堂金石文字》为光绪二年丙子(1876)飞青阁校定,光绪三年(1877)前刻成《初集》。再结合信末所署日期,可推知本函作于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六日(公历7月16日),时杨守敬在宜都。

函中有“大人殷勤下问,愧荷交拜,无以报答,用敢自陈”语,盖倪文蔚曾作函询问其学问和著作情况。杨守敬在本函谈到了自己在金石学和泉币学方面的“天性”：“唯金石一端,若有天性,岁逾一纪,寝食未忘。”还推介自己按照所藏拓本摹刻的泉图“其精者,与真不别,若再整齐,实称绝艺”。函中还表示“家贫不能购进楮蓄,良工不自毁弃,欲托之封君,自居校讎之列”,愿以自己所藏所摹泉图托之倪文蔚曾祖倪模,并举自己手辑的《楷法溯源》“署文昌潘君者”为例,劝倪文蔚让其校刻《古今钱略》。函中有“仰恳大人(按:倪文蔚)稍为资助”语,杨守敬恳求倪文蔚资助其刻印《楷法溯源》。据后函(原札第二通)有“十八日奉手谕,并赐白金五十两,以为劖劂之费”语,知倪文蔚至少资助杨守敬白银五十两。此函可见杨守敬早年家境的穷困,其著述和刻书的艰难。

本函中杨守敬举《隶释》为例,说明“唯金石文字则必亲校”,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总目后云:“右双钩古碑五十余种,宜都杨氏之所摹刻也。金石家言:尝病洪氏《隶释》,以今之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良由辗转翻刻,致斯伪误。假使景伯当日用双钩之法,今日之宝洪氏者当更何如?自洪氏至今日,碑之存者十不得三四,更数百年后,必尤多亡阙。”^①归安凌霞《天隐堂文录》有《梅花草龠石刻钩本叙》中对此亦颇为赞同,凌霞云:“近人宜都杨孝廉守敬亦有《望堂金石文字》之刻,尝谓‘洪氏《隶释》,以今之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良由辗转翻刻,致斯伪误。假使景伯当日用双钩之法,今日之宝洪氏者当更何如’,其说良是。”^②

本函所记还可补杨守敬金石文字著作《楷法溯源》的编辑者、编撰体例。《楷法溯源·凡例》云:“先生(按:指潘存)故精笔法,敬亦竭力搜讨,每得一碑,先生为点其精要,以为是皆古人精意所留。光绪丙子,敬南归,遂以墨本付敬。端居多暇,乃以先生所点出者,仿翟氏《隶篇》之例,成为此书。先生博学多通,精义卓识,罕有伦匹;敬每劝其著书,顾以老病谢。此区区者,乌足以传先生?付托非人,良用愧慙。”指出《楷法溯源》一书由潘存和杨守敬共同收集材料,由潘存点出精要,杨守敬仿翟氏《隶篇》之例,用十年时间编成。而欧阳中石在《楷法溯源》前言亦云:“《楷法溯源》由清代潘存(孺初)与杨守

①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之第十一册《望堂金石·序》,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②凌霞:《天隐堂文录》卷上《梅花草龠石刻钩本叙》,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敬共同辑字,杨氏编次,陈乔森核校。”^①认为《楷法溯源》是杨守敬和潘存合著而成。但据本函中提及《楷法溯源》的成书过程“此书本敬手辑,而署文昌潘君者,……推之以报知己”,可知《楷法溯源》实由杨守敬亲手辑成,为报潘存知己之恩,遂“推之以报知己”。本函中所述,当更符合事实。至于编撰体例,其编次和双钩描字之法,均仿《隶篇》。《楷法溯源·凡例》所记“仿翟氏《隶篇》之例,成为此书”与本函中所云“近复仿翟文泉《隶篇》之例,撰《楷法溯源》”相合。

《楷法溯源》所集之字自汉砖文至五代杨凝式《韭花帖》,涉碑帖计700多种,有名字碑大抵具在。在选录中,有些名碑大碣,钟、王之书,或有取舍,而魏、晋、南北朝造像、墓志收入极多,正如函中所言:“上自魏晋,下迄五季,东北至沧海日本、高丽等碑,西极塞外姜行本功德记,南尽滇池大小爨、南诏等碑,名碑巨碣,莫不甄录;下至浙东之残砖,供阙之造象。”

三(原札序二)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十八日奉手谕,并赐白金五十两,以为剗劂之资。又囑为迂存^②封君校泉图,慰诲殷勤,感荷无既。伏念迂公博学多通,等身著述,遭乱散佚,唯《钱略》^③三十二卷副本及《泉图》两册尚存,此及今之时所急宜摹刻者也。古今钱谱以李竹朋所刻为最博,然其学识不足,开端一序便以此道为玩好之物,知其落下乘矣。迂公《钱略》,敬虽未见,读序传知高识深造,为通儒之作,若使用敬砖刻之法以为图,而以迂公泉说证之,真空前绝后之奇也。来示以《钱略》校勘甚繁,刻资不易,然用力深者收功远,敬料三十二卷书亦不过数百金,至于校刻,敬固鄙陋,略闻绪论,若得厕名编校之列,一切薪水俱不敢受。他日书成,稍沾拓工之利,为妻子饘粥之资足矣。敢求将《钱略》副本寄读,大约不出一二年,必能竣工。若册后题识,虽皆一时名流,唯孙渊如^④、宋芝山^⑤

①《杨守敬全集》第十一册《楷法溯源》,第5页。

②迂存:即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韭瓶,又号预抡,安徽望江人,为乾、嘉时期著名钱币学家和校勘家。世居大雷岸(今安徽省望江县雷池乡),自幼酷爱读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嘉庆四年(1799)钦赐进士,就任凤阳府学教授,期满后归大雷岸,著书耕读,直至终老。

③《钱略》:即《古今钱略》,清倪模撰,“倪氏两疆勉斋”自刻本,共32卷,书口刻有“大雷岸经锄堂”字样。是书镌刻极精美,收录历代古钱拓片4000余枚,每枚钱币都按原大小摹刻。

④孙渊如:即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今江苏常州)人。

⑤宋芝山:即宋葆淳(1748-1825),字帅初,号芝山,晚号倦隰,自署约斋,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人。清中期画家兼诗人。生性傲岸不羁,淡泊名利,畅游海内,迹半天下,广交诗画名流。晚年曾任广陵书院山长。长于金石考据、篆刻书法、工画山水。

于此书有发明,其余皆酬应之作,将来摘附册尾则可。若弟刻诸跋,正恐传迂公不尽。敝邑年岁亦甚早^①,唯附郭一带差沾足,谨以附闻。匆遽不尽所言,容续禀。即请升安不庄。治晚生杨守敬顿首,二十日。

集古钩器拓本适装成,略识数语其上,不及详考。另有汉石经^②樵本,容后呈上。汉印十余卷,惜无好印□□。

按:函中有“十八日奉手谕,并赐白金五十两,以为劖劂之贐”,与《年谱》“丁丑,三十九岁”条所记“时辑《楷法溯源》成,得倪公助刻书费,又得季音及同邑诸友协助,遂鸠工刻之”相合,则本函应作于1877年。前一函作于六月六日,后一函有“十月上旬接到《古今钱略》抄本,属敬校对,适方在彝陵,为饶君季音编地志之书”、“今年(按:1877)九月至彝陵,与饶君季音谭及此事”语,再结合本函末所署日期为“二十日”,则本函应作于1877七月或八月的二十日,时杨守敬在宜都。

函中有“敢求将《钱略》副本寄读,大约不出一年,必能竣工”之语,而《古今钱略》于1879年刻成,可推知该书最终未能如期竣工,此亦为后面的信函(第十一、十三函,原序第十二、十三)内容所证实。第十一函有“此(按:《古今钱略》)书之成,又当迟至六月底、七月初矣”语,第十三函有“疑《钱略》非岁莫不能竣工,此由敬前于病中,匆遽禀报不悉之故”语。

函中提到的《钱略》即《古今钱略》,是倪文蔚族曾祖倪模享誉泉坛的钱币学巨著,最早为光绪五年(1879)倪氏两疆勉斋刻本。该书虽成稿于嘉庆十四年(1809),但因卷帙繁多,无力付梓,后竟致书稿遗失。直至光绪三年(1877),曾孙倪文蔚访得其全稿,以二百金赎归,并请杨守敬校勘并监印付梓。书前有孙衣言所撰新序,后有归安姚觐元所作新刊跋文,“大雷岸‘经锄堂’精印,为清末民初近六十年内通行之本”。该书共三十四卷,收录历代古钱拓片,于钱币多加考据,分钱图和文字两大部分。卷一至卷二十六为钱图部分,摹刻钱图4000馀品,有清钱、古刀布、历朝圆钱、厌胜钱等,还单列一卷“洋钱”;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四为文字部分,主要收录和论述自唐至明的历代货币理论及其利弊得失,并收录介绍了历代谱录和主要藏泉家,对研究清代币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参考价值^③。该书“虽宏富不及后者李氏《古泉汇》,而引据详博实有过之”^④。丁福保先生评价该书说:“是书自古货币泉刀之制及历代圆

①所记当为历史上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从1876年到1879年,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等省,持续4年遭受大面积干旱,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为严重,故称其为“丁戊奇荒”,被称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②汉石经:指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等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

③汪昌桥:《倪模及其治学精神》,《中国钱币》1994年第3期。

④饶登秩:《古欢斋泉说》,收入1926年版中国古泉学会编《古泉学》第一期,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52页。

泉,以及有清一代钱制,纤悉具备。教授又博考群书,凡历代钱监并采铜之处及鼓铸之法,每岁出钱之数,以及宋元明清纸币通塞之大凡,无不一一甄录于此书,而于钱币之本末,可称赅备无遗矣。使调国用掌三官者就而考焉,可以知古今沿革得失,因时之宜,定中制,权轻重,为补救,则其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大矣。”^①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1992年被列入马飞海、王贵忱主编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全三册精装拓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四(原札序八)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十月上旬接到《古今钱略》抄本,属敬校对,适方在彝陵为饶君季音^②编地志之书,未能分身。本月初又读手谕敦迫,乃将地志阁下,归家后校读一过,有所闻见,悉录于简端,又使书佐抄出,为札记一卷呈览。

伏念《钱略》一书,详贍出诸谱上,其图尤精妙绝伦,第二十七、八、九卷,于历代钱法利弊数陈綦详,诚体用兼备之书。此数卷尚未校,此非尽校所引原书不可,须宽以时日。唯迂公生乾嘉之间,古钱之出土者尚不若今日之夥,此则天实为之,敬窃不自量,拟为补图。其有古籍为原注失引者,则归美迂公;或原说舛误,已为前人议驳者,则竟从删削。惟嘉道以后金石家言谱录之书,迂公所未见者,则署补篇之目,敬自下己意,亦附录焉。顷已倩善书善画者五六人重为编定,大约明春可以告竣。

本朝谱钱之书,向推翁宜泉《古泉汇考》^③、刘燕庭《古泉苑》^④为详博,二家皆以身前未刻,继嗣无人,稿本几致散佚。翁谱藏燕庭家,同治戊辰,敬于刘氏寓斋见底本;刘谱近藏潍县陈寿卿^⑤家。前在京师,曾因胡石查^⑥劝歛鲍

①丁福保:《凤阳府教授倪迂存先生别传》,见《古钱大辞典》上册总论之藏泉家。

②饶君季音:即饶敦秩,字季音,宜昌东湖人,清光绪年间历任成都、资阳、仪陇、开县等地县令,在重庆开县、万州太白岩留有摩崖石刻。好古泉,著有《古欢斋泉说》,曾与杨守敬共同校勘《古今钱略》。另与杨守敬合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③《古泉汇考》:翁树培著。全书分为八卷,前六卷叙述历代钱币,自上古到明朝,卷七为其他国家 and 不知年代品,卷八为撒帐、吉语、压胜等钱。

④《古泉苑》:刘喜海编,其用自己藏品中的4000多种钱币拓片,将拓本分类排出编纂而成。现存《古泉苑》稿本100卷,收入2006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

⑤陈寿卿:即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篁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

⑥胡石查:即胡义赞(1831-1898?),字叔襄,号石槎,一作石查,室名澹淡轩等。河南光山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曾官浙江知县等。工书法、山水画,兼精篆刻鉴别,擅长金石考证之学,喜收藏钱币、书画金石及造像拓本,所藏泉币皆稀品。著有《云烟过眼录》、《澹淡轩日记》。

子年^①先生为汇刻之，期以三年，先生以年老不及待为辞。厥后潘伯寅侍郎^②欲尽刻钟鼎、彝器、款识并古刀布等，石查又举敬董校刻之役，侍郎复以罢官止。中心歉仄，谓二书不传，后来难乎为继。愤极，乃自以拓本摹刻二千余品，皆典质所成，然奢愿尚未偿也。今幸得读迂公此谱，惊喜无似。又值公祖善承先业，力能付之剞劂，敬虽不敏，亦略有所闻，附校刊之列，则翁、刘未竟之业，将今见之，真天人交会，千载一时矣。昔臧庸刻《经义杂记》^③，托之其祖玉林先生，此义前儒皆未及，自敬发之。吾乡陈小舫^④为其尊人刻《诗比兴笺》，实魏默深^⑤先生之作，江南人皆知此事。敬以默深先生《诗古微》照之，其说至确，当世不议其假托，而称其孝思，况迂公此书皎然不欺者乎？

来札云校毕即寄上，以便授梓，敬窃有所陈。荆楚之梓人，素乏良工，敬所刻《望堂金石文字》，虽蒙当代许可，其实校刻尚多未精准，印谱、泉谱、古器款识、砖瓦文字，颇能夺真，然数年心血为之耗尽。公祖官事繁剧，摹字心劳，恐未有余力校对于点画之间，若付之他人，非其夙好，纵博极群书，不免为罗长源^⑥、郑夹漈^⑦所惑。敬不嫌自媒，以此事相委，或不有负。惟

- ①鲍子年：即鲍康（1810—1881），字子年，安徽歙县人。清末著名的钱币学家和金石学家，喜收藏、精鉴赏。因名其书斋为观古阁，自号观古阁主人。道光举人，官至夔州知府。晚年退隐臆园，遂号臆园野人，致力于钱币著述。鲍康生平痴嗜钱币学，与著名钱币学家吕佺孙、李佐贤、刘师陆、刘燕庭、李竹朋相交。著有《观古阁泉说》《续泉说》《泉辨》《大钱图录》等钱币专著，考说精详，与李竹朋合编的《续泉汇》，向称选钱审慎的严谨之作。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二年（1876），鲍氏自刊自著及选刊嘉道间钱币学家已刊遗著十种，汇为《观古阁丛刻》（又名《观古阁丛书》，除《海东金石苑》外，均为钱币学专著），卷帙浩繁，刻印精审。
- ②潘伯寅侍郎：即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簠、凤笙，号少棠、郑盦。室名功顺堂、滂喜斋、汉学居、攀古楼等。苏州府吴县（今苏州市）人，祖籍安徽歙县，状元潘世恩孙。历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清代书法家、藏书家。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好善本书及金石碑版。编撰有《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附《沙南侯获刻石释文》一卷），另先后刻有《滂喜斋丛书》61种96卷、《功顺堂丛书》21种80卷、《潘刻五种》（实6种）16卷。
- ③臧庸（1766—1811）：本名镛堂，号拜经。江苏武进人。臧琳之玄孙。曾师事校勘学家卢文弨，曾助阮元编辑《经籍纂诂》。其《拜经日记》仿效臧琳《经义杂记》的体例，诠释古书疑义、校勘误字音读。
- ④陈小舫：即陈沆之子陈廷经，字执夫，又字小舫（一作筱舫），蕲水（今湖北浠水）巴河人，少师于魏源，通经世大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为人耿直，不畏权贵。曾上疏具陈边疆各省制外夷之法。
- ⑤魏默深：即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
- ⑥罗长源：即罗泌（1131—1189），字长源，号归愚，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因鉴于“史书言远古者极少”，采各种典籍以至纬书著成《路史》四十七卷。
- ⑦郑夹漈：即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世称夹漈先生。

书经重编，稿必累易，傭书绘图之费，至少亦须百金。□□无可屏当，敢恳俯赐，则成功更速。至于枣梨之费□□□省，致蹈《古泉汇》覆辙。此事关千古，一端可议，便落第二乘，不足贵矣。属为作弁言，敬以为不必，孙琴西方伯^①一序，学识皆高，文章亦尔雅可诵。卷末迂公自作序传，发挥无遗，更无庸添蛇足自秽其书。当今李竹朋、鲍子年为此道专门，而二公所作《古泉汇序》，尚未得其要领，何论他人。敬前谓此谱第三十二卷，诸名人赠言尚待刊削者此也。

再闻公祖刻有《荆州堤志》^②，编纂者为天门胡公^③，此公敬未谋面，闻其淹雅，祈赐一部。地志之学，敬少即致力于斯，撰有《历代方輿沿革图说》《历代关塞险要图说》《十六国州郡图说》^④，又补梁、陈、北周、北齐四史地理志，虽未脱稿，已十得八九。敬□年所著书以此为最，同治之初，都中相知者皆忝敬成之。厥后以好金石之学，避难就易，此道遂延阁不讲，旧稿亦半散失。弃有用之学为章句之儒，择术已疏，深为惭悔。今年九月至彝陵，与饶君季音谭及此事，颇用惋惜，劝敬重理旧业，怦怦欲动。而数年以来，食指众多，心乱如麻，加以年近四十，不复耐作蝇头细字，势不能不倩人襄助校理，力不能贍，徒深浩叹。伏维敬既仰荷裨曩，偿得格外周恤，为置一宽闲地，使其专心壹志，一二年间，必力成此书，此书成，敬亦千古矣。

公祖学优，政事在在皆可见诸施行，区区文字之名，诚非所尚。若以敬所学，有裨高深，敢以一二种相酬，此所谓相得益彰，与攘夺者异矣。敬固无闻，然不尚虚声，留京师十载，虽与一二知名士相往来，而深自钦仰。平生知交，惟文昌潘君孺初、遂溪陈君一山乔森^⑤，两君遭际与敬相等。归家后，杜门不出，无论人之所知，亦无道为人所知。有来叩者，勗以问学，如齐传楚语，终不入耳。况非其类，嫉妒尤甚，故声尘愈寂，犹惧不免。若老死不

①孙琴西方伯：即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又字克绳，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遁叟，浙江瑞安人。

②《荆州堤志》：即《荆州万城堤志》，清倪文蔚辑。

③天门胡公：当为胡祖嗣，字伯钦，汉南（今湖北汉阳）人，道光间任职湖北天门。著有《荆楚修疏指要》三卷，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④即《历代輿地沿革险要图》，是书最早为同治二年（1863）杨守敬、邓承修合编。光绪四年（1878），杨守敬、饶敦秩在此基础上，同撰《历代輿地沿革险要图》，于光绪五年（1879）付梓刊行。详见胡运宏《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輿地考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和梁前超《杨守敬与〈历代輿地沿革险要图〉》（《地图》1988年第2期）。

⑤遂溪陈君一山乔森：即陈乔森（1835-1905），晚清书画家。原名陈桂林，字木公，一字一山，又号逸山、颐山。曾于同治元年（1862）、四年、六年和十年四度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以诗、画、字皆精而闻名遐迩，有“岭南才子”之称。留世有《海客诗文集》10卷。

出,将寻与虞仲翔^①求清蝇作吊客。诚不料公祖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遽以先人手泽郑重付托,知己深于感恩,此敬所为披肝沥胆,衔结不忘者也。古器款识一卷、砖瓦文字一卷、汉石经六幅以供清玩。诸维亮察不庄,寒甚即请刻安。治晚生杨守敬顿首,十二月初三日。

来人姓向名家环,老实可靠,如有所赐,即以付之。岁莫宵小易生,专差亦可。敬又及。《楷法溯源》已刻成七卷,次第依《说文》,谨以附闻。

按:前引《年谱》“丁丑,三十九岁”条有“鳩工刻《楷法溯源》”的记载,《年谱》“戊寅,四十岁”条记:“《楷法溯源》已刊成”,此函云“《楷法溯源》已刻成七卷”、“加以年近四十,不复耐作蝇头细字”,故可推知本函应作于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初三日(公历1978年1月5日),此时杨守敬离满四十岁还差一年又一个月,时杨守敬在宜都。此日正值小寒节,故函中有“寒甚即请刻安”语。

《年谱》“丙子,三十八岁”条记“是年,陆续刻《望堂金石》。东湖饶季音(敦秩)招余至其家,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郗志群认为杨氏将此事系于光绪二年(1876)有误。其据东湖饶氏刊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中饶敦秩光绪五年五月后记所云:“光绪四年延请杨守敬至其家同撰该图。”郗志群指出所记时间亦为光绪四年(1878),并推断是杨氏年久记忆有误所致^②。但据本函中“今年九月至彝陵,与饶君季音谭及此事,颇用惋惜,劝敬重理旧业”语及“十月上旬……适方在彝陵,为饶君季音编地志之书”,可推定光绪三年(1877)九月开始,杨守敬就被饶季音(敦秩)招至其家编地志之书,正如函中所谓“重理旧业”,可能第二年(光绪四年)开始,二人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本函亦可补正《年谱》误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函中云“翁谱藏燕庭家,同治戊辰,敬于刘氏寓斋见底本”,论及刘喜海所藏翁树培《古泉汇考》稿本,与现存的原稿本是翁著刘批本相合。王献唐先生《古泉汇考跋》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③翁树培《古泉汇考》未刊行,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现存的稿本中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刘喜海计划刊印而

①虞仲翔:即三国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馀姚(今浙江余姚)人。为人刚直,志气高爽,孙权时为骑都尉官,多次犯颜进谏,被孙权流放到交州。《三国志》裴松之注:“……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青蝇吊客”,本谓虞翻心境悲伤,想自己死后无人治丧,只有苍蝇作吊客来凭吊自己。后比喻人生无一知己,孤独无友。

②详见郗志群:《〈杨惺吾先生年谱〉献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③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之《古泉汇考跋》,齐鲁书社,1986年。

未成的原稿本^①。

函中云：“吾乡陈小舫为其尊人刻《诗比兴笺》，实魏默深先生之作，江南人皆知此事。敬以默深先生《诗古微》照之，其说至确。当世不议其假托，而称其孝思，况迂公此书皎然不欺者乎。”涉及一桩久悬公案：《诗比兴笺》的作者是陈沆，还是魏源？《诗比兴笺》书凡四卷，题陈沆撰，前有沆挚友魏源序。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李瑚、顾国瑞、夏剑钦等多位学者考证^②，此书实系魏源所作，这一结论在魏源研究领域基本被认可。

五（原札序七）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奉读手谕并泉册、《万城堤志》，又赐白金百两以为傭书之资，将来补阙删繁，约不过二十卷，得数百金即能刻成，俟脱稿再行呈览。大著《万城堤志》，此经济之书，可见诸施行者，与书生高谈考古不可同日语。然其中如辨《水经》“夷水出鱼复”之说及驳正阮文达“枚回洲”考^③，亦未尝不至精确，惟“息壤”之说似尚未详，曾记应城程拳时^④《在山堂集》有《息壤考》，稍暇当为检出。校札记已存有副本，此仍缴上。其中体例，虽较原书稍密，亦后事者易为力，未必毫无可议，尚祈指示。来使急于销差，走笔复此，徐容续禀。即请道安不庄。治晚生杨守敬顿首，初十日灯下。

泉拓二册中有诸名人题识者，六月间已寄来，若必钩墨迹入木，所费不貲，敬□□□图□刻之。

按：作于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初三日的前函有“再闻公祖刻有《荆州堤志》”，而本函有“奉读手谕并泉册、《万城堤志》”，可知本函所作时间应该晚于光绪三年。本函又有“泉拓二册中有诸名人题识者，六月间已寄来”语，可知所作时间应晚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本函中有“校札记已存有副本，此仍

①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影印收入2006年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

②详参李瑚：《关于〈诗比兴笺〉与〈近思录补注〉的作者问题》，《文史》第二十一辑，1983年10月。顾国瑞：《〈诗比兴笺〉作者考辨——兼谈北大图书馆藏邓之诚题跋“〈诗比兴笺〉原稿”》，《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54-57页。夏剑钦：《魏源研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状况述评》，《邵阳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3-5页。

③“枚回洲”考：即阮元《荆州寄金洲考》（《清经世文编》卷一一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856页。）阮元根据《水经注》和《宋书》的记载，考证认为该洲即为自晋、宋至唐已有之枚回洲。

④程拳时：即程大中，生卒年不详，字拳时，号是庵，湖北应城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蕲州（今湖北蕲春）知县。清代经学家，诗人。程大中殚心稽古，淹通经史，著述甚多，如《四书偶见》五卷、《四书逸笺》六卷、《周礼外义》二卷、《诗传》四卷、《在山堂集》三十卷以及《蕲州志》《旧事考遗》《逸姓名录》《四事笺》等。

缴上”。所作校札记,应该是前函倪囑敬校对《古今钱略》抄本的校札记。据后面第九函“敬携书版于客岁冬月二十三日,搭轮船到武昌”,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守敬已经到武昌买书,则此信所作时间不会晚于十一月。由此可推断本函所作时间应该为光绪四年七月至十一月间某月初十日。本函说“六月间”而不是如后函说“前月”,后函云“刻下敝处谷米踊贵,较郡城尤甚”,应该是在九月谷米成熟之前,故此函最有可能作于八月,时杨守敬在宜都。

函中提到的《万城堤志》即《荆州万城堤志》,是记述长江中游荆江段北岸堤防的第一部专志。清同治十一年(1872),荆州知府任上的倪文蔚,因感治堤之艰难,又乏成文之规章典籍之不便。于是访求旧案,“搜辑他书,益以近事”,四易其稿,于同治十三年(1874)冬编成《荆州万城堤志》一书。《荆州万城堤志》共12卷(卷首1卷,正文10卷,卷末1卷)21万馀字,下分36目,分目合理,记叙详尽,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当时荆江防洪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形下,《堤志》的刊刻和流传,对于总结荆江治理的历史经验教训,让守堤者“不至以吏为师”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该书成书于同治十三年冬,最早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

六(原札序十一)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辱承眄睐,属以郡志,本拟竭力从事,无奈家务冗沓,未能蒞事,有负雅怀,愧甚!愧甚!客岁寄来迂公《钱略》,仅十四本,缺二本。今检得原来函封,亦只十四本,特用呈览,然则仍宜在尊厨中细觅也。至于敬所钩补诸本俱在,现已赶紧排纂,不十日,即将全稿呈上,乃见敬非徒糜费也。唯念此书公祖初意刻之甚勇,故敬辞志局,以就其大者,不知何故而又踌躇。昔顾嗣立刻《元诗选》^①,见有无数绛衣人下拜,而况为公祖之先业乎?若恐敬窜乱原书,则前已稟明,皆依原书次第发刻,不增损一字,伏惟详察。《楷法溯源》将刻成,尚待校理,大约冬月间方能携板片到省刷印。前月二十八日,本县补覆,敬之起复、丁艰文书,未识已由府署中递过否?愚为问之。又二十八日有家信一函,由马驿递送,时敬已出志局,不知此信存何处,尚祈为转掷下。前代求法书楹联,款署昆城,愚为拨冗书之。刻下敝处谷米踊贵,较郡城尤甚,病疫者亦多,尚不至大损折,并以附闻。诸惟鉴照不庄,即请升安。治晚生杨守敬顿首,初十日。

按:函中云“《楷法溯源》将刻成,尚待校理,大约冬月间方能携板片到省刷印”。而据后函(原序第十函)中有“敬携书版于客岁冬月二十三日,搭轮船到武昌”,可知杨守敬于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武昌随印随售《楷法溯

^①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间丘,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喜藏书,尤工诗,博观书画,旁收碑碣,所藏甚富。辑有《元诗选》,著有《秀野集》《间丘集》等。

源》。《楷法溯源》共十五卷，光绪三年七月开雕，至十二月刻成七卷，照此速度推算，“《楷法溯源》将刻成”的时间最早应在七月。另《楷法溯源》前有毕保釐序，作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函所作时间应早于十一月。综上，可推断本函约作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至十月间初十日，本函应晚于很可能作于八月的前函（原序第七函），结合函中“刻下敝处谷米踊贵，较郡城尤甚，病疫者亦多”语，本函很可能作于九月，时杨守敬在宜都。

函中有“本拟竭力从事，无奈家务冗沓，未能蒞事”、“唯念此书公祖初意刻之（按：《古今钱略》）甚勇，故敬辞志局，以就其大者”、“前月二十八日，……时敬已出志局”等语，可知杨守敬八月二十八日前已经辞去志局的为编纂《荆州府志》工作，原因有二：一是家务冗沓；二是想集中精力刻印《古今钱略》，此时正赶紧排纂《钱略》。

本函中杨守敬有“代求法书楹联，款署昆城，恳为拨冗书之”语，可知倪文蔚不仅勤于政事，学识渊博，而且书法亦善，所作书法及楹联为人争宝之。确实如此，除制艺诗文之外，倪文蔚还善书工画，是一位工于山水、长于书法的书画大家。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评其画云：“工画山水……沉郁浓厚，苍秀萧疏，不拘一格，洵名笔也。”^①民国郑午昌也列倪文蔚为善山水的画家，认为“皆能追踵古人，自立门户，要为一时名手”。^②

七（原札序九）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两奉手书俱收到，欣悉壹是。比维政馀多暇，《郡志》次第告成为颂。敬现已将《钱谱》排纂成帙，唯时日稍迫，未能细校□，□书原不刻不过明^③，敬亦差致力，未尽浪费耳。若必欲付梓，仍当遵前教，依迂公原书，不增损一字。唯迂公考证既明，而未见其钱，今其钱或有出土者则补之。谨将原书二部并敬所排纂之壹部呈览，若无意刻之，便可收之，若尚有意，祈仍将此书掷回，敬当遵前教再校一次。唯此书卷帙甚繁，若全刻，恐非四百金所能也。敬拟于月之中旬将《楷法溯源》板片携至宜昌，搭轮船到省垣刷印，缘敬处纸墨甚艰，人工亦贵，敬又无力措印资，所以必欲到省者，随印随售，或可稍沾馀利。前月潘孺初有信来，若敬再不至京，遂无会面之期。此公为敬之师友，受恩深重，不止鲍叔之知我。若使此公旦夕委朝露，敬不得一诀，便成终身之恨。故汲汲下省，定于明年二三月即出省入都者为此也。

前为郡志著《沿革考》，繁冗不能裁省，实不堪用。唯竭数月之力，始

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第74册，明文书局，1985年，第117页。

②郑午昌撰：《中国画学全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③此句不通，疑有衍或脱字。

成此一帙，敝帚之享，不知其非。前已将原稿付孔广森誉清，祈即飭孔生将原稿付回。又盛宏之《荆州记》、袁山松^①《宜都记》^②，前亦嘱书佐抄出大半，此虽志外之书，然亦不可缺略。或将原抄付回，敬当为排纂成之。《楷法溯源》拟印二十部，尚未完工，容日当呈览。求作大叙，以光拙著，未知脱稿否，不胜翘企之至。轮船到沙，虽停轮，不过数刻，不及进城面辞为悵。《攀古阁金文》^③贰本、《文献通考》壹本、马氏《意林》^④贰本、迂公年谱一本并奉还。《泉志》一本、《古泉丛话》^⑤仍存敝篋，容日再寄。行期在即，诸事猬集，不及作楷，伏维原谅，即请升安不宣。治晚生杨守敬顿首。

朱书田^⑥先生行略可否采入孝义传^⑦，并附。此系专人，有回信即付之。

按：《年谱》“四十岁条”记：“《楷法溯源》已刊成，省中友朋颇有欲购此书者，乃决意舍纸行交先三（按：杨守敬弟）自理，而携板至武昌为买书计。”函中云“敬拟于月之中旬将《楷法溯源》板片携至宜昌搭轮船到省垣刷印，缘敬处纸墨甚艰，人工亦贵，敬又无力措印资，所以必欲到省者，随印随售，或可稍沾馀利”，又“求作大叙，以光拙著，未知脱稿否，不胜翘企之至”。据后函有“敬携书版于客岁冬月二十三日，搭轮船到武昌……缘敬初到省，藏书之家皆未识也。《楷法溯源》已告成，求大序不得，云门（按：指樊增祥）又未晤面，急于印书，遂勉作一序，托之友人毕君”语，及《楷法溯源》有毕保鳌序，作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函中有“行期在即，诸事猬集”及“定于明年二三月即出省入都者”语，可推知本函作于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初，时杨守敬在宜都。

函中有“定于明年二三月即出省入都者”，而《年谱》“四十一岁”条记：“九月，携眷入都，而以板片交张玉生。”可知最终杨守敬未能按计划于光绪五

①袁山松：又名袁崧（？-401），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时即有才名，博学能文。历任宜都太守、吴国内史，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死于孙恩之乱。原有集十卷，已佚。另著有《后汉书》百卷，已散佚，清人有辑本一卷。

②《宜都记》：或称《宜都山川记》，为晋宋间名士袁山松所作。记述宜都的山川风物，其对三峡的描写极为生动。南朝山水文以及《水经注》等受其影响极大。原书散失，杂见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书。

③《攀古阁金文》：即《攀古楼彝器款识》。

④马氏《意林》：即唐马总所撰《意林》。

⑤《古泉丛话》：（清）戴熙撰，同治十一年（1872）吴县潘氏滂喜斋刻本，收入李佐贤《古泉汇》首集卷三，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曾影印发行。

⑥朱书田：即朱占元，字书田。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十六朱书田传记载：“岁贡生，授徒养母，家贫常自减其食以奉，弗令母知也。”（《中国方志丛书》之《荆州府志》，第3册，718页）

⑦光绪《荆州府志》人物志中卷五十四至五十六为《孝义传》。

年二三月入都，而是推迟到了九月。

据函中“前月潘孺初有信来，若敬再不至京，遂无会面之期。此公为敬之师友，受恩深重，不止鲍叔之知我。若使此公旦夕委朝露，敬不得一诀，便成终身之恨”，杨、潘二人之间的真诚情谊，亦可见一斑。晚年杨守敬自作《年谱》中再次申述二人情谊，《年谱》“四十一岁”条记：“及至都，时孺初住雷阳食馆，守敬遂依之。既而鼎丞^①亦入都，初晤即意见不合，久之益齟齬。时空手入都，距会试尚远，进退维谷，而孺初力任卖斧，嘱余不随鼎丞去。孺初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减食，以济吾困，此情此境，不堪回首，记之以告吾子孙，其恩不可忘也。”

八（原札序十五）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顷陈述贤书台端□来，尚无谬误，唯其领钱究在何处，伏祈示知。敬拟与石子韩同撰《古文汇篇》，两家所藏金石书甚备，独无潘伯寅《攀古阁》一书，此书敬借阅一过，旋还尊架，伏恳再赐一览，至祷！至祷！此上，即请旅安不庄。治晚生杨守敬顿首。

《荆州沿革山川考》二本附呈。再敬所排纂《钱略》，不第，洋钱印诸品及厌胜、打马皆未全钩。习少牧^②处既有底本，无妨悉数寄来。缘习君所摹最精，敬所摹只能双钩，似不如其毫发毕肖。现拟先刻首卷、宋体及刀布正品，余悉候习本寄到，再为开雕。守敬又及，《攀古阁》万祈假读。

按：前面第六函云：“现已赶紧排纂，不十日，即将全稿呈上”，第七函有“敬现已将《钱谱》排纂成帙，唯时日稍迫，未能细校（补）……谨将原书二部并敬所排纂之壹部呈览，若无意刻之，便可收之。若尚有意，祈仍将此书掷回，敬当遵前教再校一次。”本函有“敬拟与石子韩同撰《古文汇篇》”、“现拟先刻首卷、宋体及刀布正品，余悉候习本寄到，再为开雕”语，作于己卯（1879）正月初六日的后函（第九函，原序第十函）有“敬住马家巷东首林公馆间壁，地太偏僻，如有回音即交江汉关委员石子韩转寄”语，可推断本函大概作于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时杨守敬在武昌。

函中所提及的石子韩即石宗建，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喜藏金石，辑有《古欢阁双钩秦汉石刻》，有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石子韩曾校订清代夏宝晋编的《山右金石录》三卷，有光绪八年（1882）归安石氏刻本。杨守敬与石子韩

①鼎丞：即王定安（1833-1898），号鼎臣，湖北东湖（今湖北宜昌）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为曾国藩幕僚，历官山西冀宁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工古文，喜藏书。著有《空舫文钞》、《续古文辞类纂》、《曾文正公事略》、《曾忠襄公年谱》。

②习少牧：生平不详。倪文蔚所修光绪《荆州府志》监刊人为习炽昌，为东湖人，时候选从九品，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多有交往,《年谱》“三十七岁”条记“又因天津友人及子峩^①致书于上海同乡为我吹嘘”,四十一岁条记“因石君子韩吹嘘,卖书(按:《楷法溯源》)亦颇得利”。石宗建曾做过湖北监利知县,后官扬州,歿于任上。石临终前嘱其家人将他所藏的碑帖金石悉数托李盛铎保存,后来李盛铎潜心金石,亦源于石宗建的影响。本函中“敬拟与石子韩同撰《古文汇篇》”及后面第十函中“况敬欲刻《古文汇编》”所提到的《古文汇编》,经遍查,未见著录,据本函,可知此书当为石宗建和杨守敬根据“两家所藏金石书”编刻而成。李盛铎二十岁时(1878年),与石宗建合编《俪青阁金石文字》^②,函中的《古文汇编》是否即是《俪青阁金石文字》,尚无法确定。可能当时石宗建让杨守敬刻印其与李盛铎合编的《古文汇篇》,后来定名为《俪青阁金石文字》。

九(原札序十)

豹岑大公祖大人阁下:

睽违钩海,邈若山河,不胜翘企,恭维起居曼福为颂。客岁又蒙赐白金五十两,敬自维于迂公之书,未能有所增益,乃累承厚贶,实深愧慙。敬携书版于客岁冬月二十三日,搭轮船到武昌,带小儿、小妾并家丁一人,是皆粗知书史,可以监刷印,助校刊者也。唯迂公此书不刻,敬终以为缺陷。此公竭三十年之力成此书,不幸未授梓而歿,粤寇之乱,不大于劫灰者仅耳。敬携此书到省□人,梓人有云四百金可以成功。又有渔古山房书庄^③情愿先垫刻费,唯书成之后,彼必先印行百馀部以求息利,而后以板归公祖。问何时可成,期以百二十日。敬本在省售书,大约此数月内亦未能入都,可以校刊竣事。维公祖之意非惜此四百金,亦不过恐其不成,中道而废耳,若如此办法,似乎无碍。若以先人秘笈,不肯假手他人以获利,则速赐回音,以便将原书缴还。前札嘱校定此书后交令弟^④收存,敬访之,藩礼房云已刻到汉阳出差。敬以书尚未校讫,又岁暮匆遽,未能过江访谒,稍暇必能晤会也。

①子峩:即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因专研西学、致力洋务,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赏识。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经李鸿章荐,以侍读任清政府驻日公使,为清朝第一任驻日本大臣。光绪六年(1880)夏,杨守敬应何如璋之招请,作为随员出使日本。

②详见熊学明、高平:《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2期,第65页。

③渔古山房书庄:是武昌的一家有名的雕版木刻作坊。清光绪十九年(1883)九月,刘光第《南旋记》“初七日”条云:“念廖、卢二公待久,心甚不安,早晨过江开船。先一日在汉口市渔古山房,收得《皇朝经世文编》一部八十本,价六千,纸白而燥,江西板,不少磨灭字面,非善本也。”

④令弟:当为倪文英,字槩甫(约生于1841—1845),号雷池,安徽望江人。清代画家,善山水。光绪间官江苏候补道。

《志书》想已告成，刻此书时可不列贱名，盖本无功也。必不获辞，附于分校之列，如厕诸总纂则不敢居。盛宏之《荆州记》，尚未得《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掇抄。缘敬初到省，藏书之家皆未识也。《楷法溯源》已告成，求大序不得，云门又未晤面，急于印书，遂勉作一序，托之友人毕君^①，文辞浅陋，且于此体素非当家，故未敢冒公祖大名，恐有损文声耳。不以此书为可哂，仍请作序，以光拙册。呈上式样壹部，中多讹夺，尚待校补也。敬仓皇外出，本拟移家至省垣，而人口众多，措赏不易，此复尚恳拂拭，则没世感戴，读嵇叔夜《悲愤诗》，可以知敬之苦心矣。临纸神驰，勿任惶恐。诸惟亮察不宣，即请升安，并贺年喜。治晚生杨守敬顿首，己卯正月初六日。

敬住马家巷^②东首林公馆间壁，地太偏僻，如有回音即交江汉关^③委员石子韩转寄。

按：函末署“己卯正月初六日”，则本函作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六日（公历1月27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函中云“敬携书版于客岁冬月二十三日，搭轮船到武昌，带小儿小妾并家丁一人，是皆粗知书史，可以监刷印”，与《年谱》“戊寅，四十岁条”记“因只身出门，经理无人，纳龚氏，并长子道承携以自随”所记相合。

据前面第六函“唯念此书公祖初意刻之甚勇，故敬辞志局，以就其大者，不知何故而又踌躇”。可知在杨守敬将《古今钱略》排编成帙、校对即将完成时，倪文蔚在刻印《古今钱略》一事上又“踌躇”，故本函杨守敬再次劝说倪文蔚，他说：“唯迂公此书不刻，敬终以为缺陷。”并提出几点理由：一、此书写成与流传不易，是倪之叔祖迂公“竭三十年之力成此书，不幸未授梓而歿”；二、刻印费用也不多，自己“携此书到省如人，梓人有云四百金可以成功”，而且“渔古山房书庄情愿先垫刻费”，书成之后，书庄“先印行百馀部以求息利，而后以板归公祖（按：倪文蔚）”；三、书刻成时间也不会太长，“期以百二十日”，自己还可以趁在武昌售书的几个月时间内校刊竣事。在杨守敬的再三劝说下，《古今钱略》得以刊印。

函中有“《楷法溯源》已告成，求大序不得，云门又未晤面，急于印书，遂勉作一序，托之友人毕君”语可知《楷法溯源》序并非如其所署“薪水毕保釐作”，而是杨守敬自作。杨原是想请倪文蔚为《楷法溯源》作序，或是请善于作

①毕君：即毕保釐。《楷法溯源》序署薪水毕保釐撰（序作于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毕保釐，字东屏，薪水（今湖北浠水）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曾任贵州乡试正考官、苏州知府。

②今武昌区仍有马家巷。

③江汉关：即汉口海关，位于今江汉路与沿江大道交叉路口。经清廷总理事务衙门批准，于1862年1月1日正式建立。汉口开埠前，清政府在武汉三镇设有内陆关卡，如武昌的江关、汉阳的朝关、汉口的汉关。1861年，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将汉口辟为对外贸易口岸，设江汉关。

序的指樊增祥代作，因急于印书，自己勉为作序，而托名毕保鳌。据函中“不以此书为可晒，仍请作序，以光拙册”语，知杨守敬再次诚请倪作序，但查光绪五年（1879）所刻《楷法溯源》，未见倪序。

由函中“敬住马家巷东首林公馆间壁，地太偏僻，如有回音即交江汉关委员石子韩转寄”，可知杨守敬到省垣武昌卖《楷法溯源》一书时，住在比较偏僻的马家巷东首林公馆，住的还是间壁，这可能与当时杨守敬经济比较拮据有关。因所住地偏僻，杨、倪二人书信往来，需要由任江汉关委员的石子韩转寄。

十（原札序十四）

读手书敬悉。据刻工云洪北江^①之书系六八寸，又薄且有厢板，此书七九寸且六分成，非八十文不能购得，但此事彼不能全做主，购板时敬必亲到讲价。况敬欲刻《古文汇编》，虽要板无多，亦必亲自购办，此辈亦无所容其欺。昨细检此书，约八百块双面，三百块系宋体用，五百块刻图用，且以每块八十文计之，当得六十四串，写宋字以三十万，约计当得四十串。此宜先付，盖八百块板片势不尽得干板，恐有稍湿，当预办候干，故开工即要此款也。行旌何日，当走送。即请豹岑大公祖大人晚安。治晚生守敬顿首，初五日灯下。

按：作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六的前函中，杨守敬还在劝倪文蔚刻《古今钱略》，而作于五月初八日的后函中，倪“嘱（杨守敬）将第二十八卷引书体例改刻”，本函署“初五日灯下”，可知本函所作时间为光绪五年（1879）二月至四月初五日，据后面十二、十三等函所说的写刻《古今钱略》的进度，可推断本函很可能作于二月初五日（公历2月25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本函主要谈及购买书板及估算刻资。函中云“此书七九寸且六分成，非八十文不能购得”，可知用的木板比较好，因此，书板价格比一般的书板贵。函中杨初步估算了所需木板费用和写样费用：“昨细检此书，约八百块双面，三百块系宋体用，五百块刻图用，且以每块八十文计之，当得六十四串，写宋字以三十万，约计当得四十串。”此函为我们保存了较丰富和真实的经济史料，除了具有经济价值外，亦反映出杨守敬精于经商，正如函中云“购板时敬必亲到讲价……亦必亲自购办”。杨守敬从小就因父早亡而学习经商，《年谱》“己酉，十一岁条”记：“祖父以年近七十，店中无人经理，乃嘱守敬及先三皆辍读。以守敬至孙姑夫店……均学商业。”“庚戌，十二岁条”记：“乃嘱守敬回家在己店照拂。”后祖父年迈，很早就承担起家庭重任，其中举之后，七次入京参加会试，皆不中，只能以举人身份开馆授读，经济一直比较拮据，加上其弟弟先三开米

^①洪北江：即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其精于史地和音韵、训诂之学，善诗及骈体文。所撰《三国疆域志》是古地理研究中重要文献。另著有《北江诗话》。

行、纸行皆常常负债，又染上吸食洋烟的毛病，常需杨守敬资助。由于这种原因，杨守敬自小就精于计算。

十一（原札序十二）

豹岑公祖大人左右：

顷尊纪^①来省，递到手书，知以前有赐章，并嘱将第二十八卷引书体例改刻。惟此信并原印书样至今未接到，不知是由何处寄来。又嘱为雇写手二人，当即特嘱刻字人物色之，皆云志书局所请写字工价每千字必得壹百三十文。又闻志书已得一半，彼来写字，一人不过十万。又去上下盘费数串，除日用火食，几不能剩数串，故人人趑趄。而此地佳写手亦实少，前领手人袁姓屡次带信来，云工人往者为此也，如必要人，须略增价，上下盘费纵不全认，亦给一半，方有好手。《钱略》又刻得数卷，时值农忙，工人多告假回家，刻下始渐有人来。盖此地刻字人亦农亦工，非得重资，不肯舍其田事。此书之成，又当迟至六月底、七月初矣。盖又恐其刈获时有担阁也。顷闻有人云钱图每品四十文价太昂，彼不知其费功，其中若压胜、洋钱诸品，竟有每人一日不能刻成一品者。倒是宋体每字一文，彼尚乐于从事，一言刻图即人人皱眉。旁观者不知当局之难，敬若非平日受公祖知遇之感，几不能终其事。非敬轻诺，良由领手人轻诺，然刻图确难，然即万难，亦必终其事。前云图样当印墨本，宋体当印硃本，非有他意，不过以墨本好看，图之神气，此书成，公祖未印本，而有一部行世。敬岂复得为人乎？岂有以重资购不全不备之书者乎？既有言，当遵命尽印红本。连日肚泻，力疾草此。不恭祈恕之，为请升安不宣。晚生守敬谨稟，五月初八日。

按：此函当作于光绪五年（1879）五月初八日（公历6月27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本函叙述代雇写手和刻写泉图之难。关于雇写手之难，函中云：“志书局所请写字工，价每千字必得壹百三十文。又闻志书已得一半，彼来写字，一人不过十万。又去上下盘费数串，除日用火食，几不能剩数串，故人人趑趄。”所以，“如必要人，须略增价，上下盘费纵不全认，亦给一半，方有好手”。函中所述也为我们保存了很有价值的经济史料。

至于杨守敬刻《古今钱略》之艰难，函中云：“顷闻有人云钱图每品四十文价太昂，彼不知其费功，其中若压胜、洋钱诸品，竟有每人一日不能刻成一品者。倒是宋体每字一文，彼尚乐于从事，一言刻图即人人皱眉。”压胜、洋钱诸品因为“费功”而“竟有每人一日不能刻成一品”，所以刻《古今钱略》四千馀品钱币其费工之程度可想而知，故杨守敬也感叹“刻图确难”，说“若非平日受公祖知遇之感，几不能终其事”。但他感倪文蔚知遇之恩，决心“然即万难，亦必

①尊纪：意即尊介，旧称他人之仆。此指倪文蔚的仆人。

终其事”。今存“倪氏两疆勉斋”自刻本大型古钱币巨著《古今钱略》，共32卷15巨册，计4000余枚，就刻印而言，共刻数千幅精美古钱币图，图文并茂，镌刻极精美，杨守敬做出了重要贡献。函中还提到杨守敬认为“图样当印墨本，宋体当印硃本，非有他意，不过以墨本好看图之神气”，亦反映出杨守敬在刷印《古今钱略》时的考究。今存其刻印的《古今钱略》装订考究，纸质颜色一致，均为上好的清代上等白宣纸精印，墨色乌黑浓郁，这与杨守敬的“费功”是分不开的。“倪氏两疆勉斋”自刻本《古今钱略》的刻印，在木板印书之古代可谓壮举，为丁福保先生等钱币名家所推崇备至。

十二(原札序三)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前由贵纪达一函，谅邀青览。前刻人袁姓来此倩写工，此地人多不愿之，俱详前书中，惟有在敝寓，雷君系为写《钱谱》之人，现值《钱谱》已竣工，敬力怂恿之，始允。《钱谱》与洪彦哲^①商酌后，又请姚方伯^②审定板再发钞。缘方伯将书持去之后，久未掷还，日日着人催之，总以未克编览为辞，盖方伯亦好此书如酒也。因之工人住手近一月，适值蕲门张瑜生^③重刻《隶篇》，敬因让其刻之，现《隶篇》亦告竣，刻字人甚多，书亦斟酌尽美。唯所存未刻之板片仅二百块，尚须用约三百块，数月内此地并无卖板片人，唯思敬家中尚有板片约三百块，意欲恳公祖专差或有便人送去。亦可到敬家中，将此板片取下，到沙市再搭妥船寄来，敬已属家中专人送下，但恐未必有人来也。大约不出二十日到汉，此板尚有用也。半月以来，患水泻，颓唐之甚，力疾草此不庄，诸维亮察，即请升安。晚生守敬顿首，（五月二）十五日。

按：《年谱》“己卯，四十一岁”条记：“九月，携眷入都，而以板片交张玉生。”知杨守敬光绪五年（1879）九月到了京师，由作于“五月初八日”的前函云：“连日吐泻，力疾草此。”知五月尚于病中刻《古今钱略》。本函云：“半月以来，患水泻，颓唐之甚，力疾草此，”据下一函所署“六月十一日”，可推

①洪彦哲：生平未详，疑为洪亮吉后人，据郭嵩焘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时作的日记《伦敦与巴黎日记》，洪彦哲曾补刊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入洪亮吉《卷施阁甲集》卷末。

②姚方伯：即姚觐元（？-约1902），清代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字彦侍、彦士，晚号复丁老人，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姚文田之孙。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湖北提刑按察使司等。其好文字、音韵之学，精于目录之学，工书法，善治印。著有《大叠山房诗集》《集韵》《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咫进斋书目》《咫进斋善本书目》，并辑《汉印偶存》。

③张瑜生：《邻苏老人年谱》“己卯，四十一岁条”记“九月，携眷入都，而以板片交张玉生”，当为同一人。

知本函应作于光绪五年(1879)五月二十五日(公历7月14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本函主要谈及所找志书局写字工、刻工停刻《古今钱略》另刻《隶篇》及尚缺刻《古今钱略》板片等事。杨守敬解释了刻工停刻《古今钱略》的原因:姚方伯“将书持去之后,久未掷还”造成“工人住手近一月”,恰好友人“张瑜生重刻《隶篇》……因让其刻之”,杨认为这些并不会影响刻印《古今钱略》一书的进度和质量,函中云:“现《隶篇》亦告竣,刻字人甚多,书亦斟酌尽美。”

十三(原札序十三)

豹岑公祖大人座右:

和斋来省,得读手教。疑《钱略》非岁莫不能竣工,此由敬前于病中,匆遽禀报不悉之故。前云欠板片三百块者,非《钱略》实欠三百块,因敬家中尚存三百块,既往取,不得不尽数搬来,以备拣择,其实不过欠数十、百块耳。现在业已购买足数,并不需家中之板。《钱略》现已刻得十分之七,不过尚未收拾净尽,数日后必有红样十馀本呈览。所馀未刻之书,仅第一卷及副品数卷耳。若非炎暑,二十日定可成功。已嘱工人刻期于七月初十日竣事,并领工人见和斋,订以勿得误期,纵有参池,谅亦不得出四五日。总之,驾临鄂垣时,全书准定告成。至前日停工刻他书,此亦有故,盖因《钱略》底本求姚方伯鉴定,方伯欣然允诺,及呈去两月有馀,未得领回,敬催之不下六七次,恳请其审定,又许为细校,遂亦不敢自作主张。及赐还则又多所更定,又不能不嘱工人重写重割,尚有未尽校出者,敬又为重理一番。又加以板片不齐,他人板片多薄且间有厢者,此厚而整,所以难得,非刻他书有板,此无板也。所未刻之洋钱等品,工人复多畏难。适值友人张瑜生欲刻《隶篇》,商之于敬,敬因刻样未校定,恐停工人散即难复聚,故让其刻一月,岂敢故搁《钱略》而别刻他书乎?至所存刻费,敬分毫未曾妄动,至今添裕之钱,尚未用完,可覆问也。总之,书一日不成,公祖一日不再与钱,稍有欠缺,敬当设法垫之,若半途而废,敬将何颜以对,专此禀明。临颖悚惶,诸维鉴察,即请升安不庄。晚生杨守敬顿首,六月十一日。

按:前函中有“连日肚泻,力疾草此”与本函“此由敬前于病中,匆遽禀报不悉之故”所述相合,则此函当作于光绪五年(1879)六月十一日(公历7月29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本函主要谈及缺板、刻印进度及刻费等事,再次解释停刻《古今钱略》另刻《隶篇》的原因。关于刻印进度,函中云:“总之,(倪文蔚)驾临鄂垣时,全书准定告成。”按:光绪五年(1879),倪文蔚任湖北乡试内帘监试,乡试时间一般在八月份,故杨守敬预计倪文蔚八月驾临鄂垣担任乡试内帘官时,《古今钱

略》一书准定告成。

前面第十一函中杨守敬曾预计“此书(按:指《古今钱略》)之成,又当迟至六月底、七月初矣。”原因在于“时值农忙,工人多告假回家……此地刻字人亦农亦工,非得重赏,不肯舍其田事……盖又恐其刈获时有担阁也”。本函云“若非炎暑,二十日定可成功。已嘱工人刻期于七月初十日竣事,并领工人见和斋,订以勿得误期,纵有参池,谅亦不得出四五日”,大概倪文蔚一再催促早日刻写竣事,据前函倪还可能责怪杨守敬停刻,故杨守敬要一再解释停刻之原因和保证尽快完成。

十四(原札序一)

顷拜谒,不遇为怅。《钱略》已刻成,此系初印样本,除前已呈览数本外,一并呈上,其有误字等等,随飭修改,大约不过数日,即能竣工,其账簿容日清理。板片存于何处?祈示知。所欠刻费已长,用过添裕三四十串。可否再拨数十串,先开零碎之工钱,其余候算清后结给。驾临省垣,想必应接不暇,未知何日得闻书再走候,特此留字。即请豹岑公祖大人升安不庄。治晚杨守敬顿首。

此红样颜色不佳,印手亦劣,缘印此一项,需钱二串有馀,工人不肯再印,如要再印看样,可否以绿色印之,则价廉而鲜朗矣,再稟。

按:《年谱》“己卯,四十一岁”条记:“豹臣太守知余在省垣,以其叔祖模《古今钱略》稿本付守敬,使刻之。”函中有“《钱略》已刻成”、“驾临省垣”等语,则本函亦作于光绪五年(1879)。杨守敬于光绪五年九月入京师,据前面第十一函(原札序第十二函),杨守敬预计“此书(按:指《古今钱略》)之成,又当迟至六月底、七月初矣。”作于六月十一日的前函(第十三函)中,杨守敬保证八月倪文蔚“驾临鄂垣时,全书准定告成”,并推算“所馀未刻之书……若非炎暑,二十日定可成功。已嘱工人刻期于七月初十日竣事,并领工人见和斋,订以勿得误期,纵有参池,谅亦不得出四五日”。而下一函署“十六日灯下”(当作于八月)本函云“《钱略》已刻成,此系初印样本,除前已呈览数本外,一并呈上,其有误字等等,随飭修改,大约不过数日,即能竣工,其账簿容日清理”,并有“驾临省垣,想必应接不暇”的猜测语,可推定本函当作于光绪五年(1879)七月底或八月初,最有可能作于七月底,时杨守敬在武昌。

十五(原札序六)

豹岑公祖大人阁下:

今日辰刻,有要事过江。当已嘱工人将书板清理,每架帖有卷数,共板片七百二十八块,壹千三百八十三叶,封面、签子在外,是小儿亲手交清白,并非含糊了事,或习君一时未能了了耳。此板将来如要修整,可问普渡

庵^①陶之冈^②，缘敬之板片皆交是人清理也。徐十部书已成，特未穿线，已饬赶紧订讫，敬督同工人，无论三四更，总将此书送呈。敬本拟随同来人走谒，恐工人因天晚四散，故必督催，订成方许歇息，明日辰刻，定当趋送行旌。屡承赐以厚赆，愧感无似，谢谢！又承赐书二部，因思此十部为精，不如将前日所缴之二十部中换来两部，则公祖可多得两部精本也。诸维亮察，即请行安不庄。晚生守敬顿首，十六日灯下。

按：前函杨守敬询问“板片存于何处”，本函云：“当已嘱工人将书板清理”。前面第十三函云“驾临鄂垣时，全书准定告成”，本函则有“敬本拟随同来人走谒，恐工人因天晚四散，故必督催，订成方许歇息，明日辰刻，定当趋送行旌”。据倪文蔚本年八月驾临鄂垣担任乡试内帘官，可推知本函书于倪文蔚刚到省垣武昌，结合信末所署“十六日灯下”，此函当作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1日），时杨守敬在武昌。

本函为此批书信的最后一函。《年谱》“己卯，四十一岁条”记：“九月，携眷入都，而以板片交张玉生。”可知作此函不久，九月杨守敬即“出省入都”，到京城见潘存，并参加会试，第二年（1880年）三月会试未考中后，四月直接去了日本，故陶风楼所藏再无他函。

【作者简介】占如默，男，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普渡庵：未详。今武昌有普渡寺。另据成书于19世纪20年代的《汉口丛谈》记载，仅在汉口存在的寺庙观庵就多达一百多处，汉口河街（今沿江大道）和中路（今中山大道上段）均有普渡庵。据函中“今日辰刻，有要事过江。当已嘱工人将书板清理”语，当为汉口的普渡庵。

②陶之冈：未详。疑为陶子麟族叔，时陶子麟在其刻字作坊做工。陶子麟（1857-1928），清末民国时期公认的“刻书第一国手”，以摹刻仿宋体及软体字为特长，时有“陶家宋槧传天下”的美誉。